

夏衍戲劇研究資料



中國戲劇出版社

.3-53

书名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朱金顺

夏衍戏剧研究资料(上册)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5,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5}{8}$ 插页 3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6

定价 0.74 元



夏 衍 同 志 近 影

目 录

—

历史与讽喻·····	夏衍 (1)
——给演出者的一封信	
《赛金花》余谈·····	夏衍 (6)
《秋瑾》再版代序·····	夏衍 (9)
秋瑾不朽·····	夏衍 (11)
《上海屋檐下》自序·····	夏衍 (15)
《上海屋檐下》后记·····	夏衍 (17)
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	夏衍 (20)
关于《一年间》·····	夏衍 (27)
《心防》后记·····	夏衍 (32)
别桂林·····	夏衍 (34)
——《愁城记》代序	
忆江南·····	夏衍 (39)
老鼠·虱子和历史·····	夏衍 (41)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一	
胭脂·油画与习作·····	夏衍 (44)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二	
公式·符咒与批评·····	夏衍 (47)
——《法西斯细菌》代跋之三	
关于《法西斯细菌》·····	夏衍 (53)

改编《复活》后记·····	夏衍 (57)
《戏剧春秋》后记·····	夏衍 (61)
记《离离草》·····	夏衍 (64)
《芳草天涯》前记·····	夏衍 (68)
《考验》后记·····	夏衍 (69)
《夏衍选集》代序·····	夏衍 (71)

二

走过来的道路·····	夏衍 (81)
旧家的火葬·····	夏衍 (88)
谈自己·····	夏衍 (92)
《边鼓集》后记·····	夏衍 (96)
《刼余随笔》前记·····	夏衍 (98)
忆阿英同志·····	夏衍 (101)
中国话剧运动的历史与党的领导·····	夏衍 (108)
难忘的一九三〇年·····	夏衍 (116)
——艺术剧社与剧联成立前后	
论剧本荒·····	夏衍 (123)
——在“香港青年戏剧协会”讲	
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	夏衍 (126)
——复于伶	
给战地戏剧工作者的一封信·····	夏衍 (130)
观剧偶感·····	夏衍 (134)
戏剧抗战三年间·····	夏衍 (140)
关心的，熟悉的·····	夏衍 (145)
——给某杂志编者的信	
戏剧运动的今日与明天·····	夏衍 (147)

论正规化.....	夏衍 (150)
——现阶段剧运答客问	
历史剧所感.....	夏衍 (161)
柴霍夫为什么讨厌留声机.....	夏衍 (166)
——答《国讯》编者的信	
戏剧与人生.....	夏衍 (171)
——答一个不相识的朋友	
从迷雾中看一面镜子.....	夏衍 (175)
——几个现代剧中所反映的妇女问题	
于伶小论.....	夏衍 (180)
为中国剧坛祝福.....	夏衍 (187)
无名英雄赞.....	夏衍 (189)
《夜店》回忆.....	夏衍 (191)

三

夏衍年表.....	会林、绍武 (195)
-----------	-------------

历史与讽喻

——给演出者的一封信

夏 衍

××兄：

信收到了，我那贫拙的习作在您的导演之下有一个上演的机会，这在我当然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了，感谢您对于这作品的诚挚的批判，更想借这个机会粗率地回答您所提出的几个疑问。

第一，您说这作品最大的缺点是在不曾正面的说明庚子事变的历史的意义，不曾充分地剖析义和团发生的原由，单描画了几个事变中的人物的容貌，而使历史的事件退处到背景的地位，所以，您以为“既经接触到这个伟大的悲剧的时代，就该抛开赛金花个人的故事，而正面的去描写这一个时代。”

在答复这一个问题之前，我得简单地说明这习作的作意。去年深秋，我在一个北国的危城里面困处了两个月之久，在当时的这种急迫惶遽，可也点缀了不少喜剧材料的空气里面，使我惊异地发现了李伯元三十年前在《官场现形记》中所描写的人物，依旧还活生生的俨然存在我们的前面；我将这种印象讲给居停的房主人听，他就很兴奋地和我讲述了三十七年之前他所经历过的庚子战后的情景。对于这种毫不思索地可以唤起的“联想”，自不免有了很多的感慨，于是我就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将那些在这危城里面活跃着的人们的面目，假託在庚子事变前后的人物里

面，而写作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

因为最初的着想如此，只想对于那些愿为奴隶和顺民的人们加以讽刺和咀咒，所以在性质上说，这习作只是以反汉奸为中心的奴隶文学的一种。高踞庙堂之上，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刺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也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想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后景的奴才群像，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习见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弱点的平常的女性。我尽可能的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缘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

为着要使读者能够在历史的人物里面发见现今活跃着的人们的姿态，也可以说是为着要完成讽喻（allegory）的作用，我于是避开烦琐的自然主义的复写，而强调了可以唤起联想的，与今日的时事最有共同感的事象。但是，构成历史的各种动因，是复杂而错综的，我们不能将历史的诸种动因固定化和一样化起来，我们该从历史的流动过程里去，而把握历史事象的发展。讲庚子事变，它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中日战争之后的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紧，清朝威势的失坠，外国资本和以宣教士为先锋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腹地，政治腐败，教民凭借洋人势力，勾结官厅，压迫民众，于是在满清暴政下面重压着的农民大众，从民族的仇恨，激起了“反清灭洋”的反

抗，可是这种运动只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迷信神权，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它形成了一种群众力量之后，就被封建的统治所在利用，换上了“扶清灭洋”的旗帜，而变成了替几个清室贵族争夺领导权的工具。结果，因为他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没有组织，不懂策略，所以在国内引起了民众的反抗，在国外招致了八国联军的攻击，而终于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在这整个历史事实里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加紧，满清政府的愚昧无能，和在这环境之下产生出来的凌虐同胞和谄媚外人的“风气”，很和我们目下生存着的现状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是当时帝国主义的性质，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关系，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地位，政治经济状况，人民文化程度，民众组织力量，……显然的已经和目前情势不一样了。现在，这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在讽喻，而讽喻史剧的性质上就需要着能使读者(观众)不费思索地可从历史里面抽出教训来的“联想”。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八国联军联想到飞扬拔扈、无恶不作的“友邦”，从李鸿章等等联想到为着保持自己的权位和博得“友邦”的宠眷，而不恤以同胞的鲜血作为进见之礼的那些人物，但是，我却绝不希望读者从原始的农民暴动联想到目前的民族自卫运动，更不希望读者从那无组织的乌合之众的失败，联想到救亡自卫的前途。

对于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在写作过程里面惶惑了许久。道路，是决定了的。第一，从作者的观点，分出更多的篇幅来分析庚子事变的成因，叙述他的经过，和批判他的错误；第二，那就是简单地说明了义和拳的成因之后，就集中力量来强调事变里面和目前情势有共同感的几个因子，而意识地避开了对于目前救亡运动没有推动作用的那些事象。您对于我的希望是前者，而我终于决定了后者的路了。原因，只是为了假使

走前者的路，那不仅方法要从讽喻史剧改为正规的以批判为原则的史剧，就是题名也非从《赛金花》改为《一九〇〇年在北京》不可，因为，这已经完全是别一个性质不同的戏了；假使依旧维持原有的Plot不变，那么全般的处理事变也许会形成伤害作品的“多余”，不强调某一些动因而只概念的处理全般，那就会使读者联想到作者所不希望他们联想的方向。我不抛开赛金花个人的故事，而只画了一幅面目不很凸出的庚子为背景的奴才群象，原因就在这么一点。承朋友们帮助，替我陆续的蒐集了许多关于拳乱的史料，我未来还想再写一个正面的处理事变的剧本，可是为了上述的原委，使我觉得既然同样的“写失败的历史”，那是在明快地激动观众之点，无疑的刘永福台南抗敌的历史，要比庚子的题材好得多了。上次和您讲起的《明末遗恨》的计划，我想将李闯写成《自由万岁》中的Villain一般性格的农民暴动的首领，将吴三桂写作宁愿送给敌人，不愿让给家奴的民贼，但是同样的为着要避开有不良效果的联想，我不愿象普通小说戏剧一样地将大量的同情，寄托在一个无能的崇祯帝的身上。

第二，是夸张了的讽刺是否损害作品真实性的问题。在这一点，我的态度已经说明在上述的作意里面，我为着要对那些在危城中活跃的人们投掷最难堪的憎恶，自不能不抓取他们的特征而加以夸张的描写，我要剥去他们堂皇冠冕的欺瞒大众的外衣，而在观众面前暴露他们“非国民”的丑态。对于真实性的问题，当我计划这作品的时候，曾在东京出版的杂志《织近》上面读过一篇江森盛弥氏的论讽刺文字的文章，他以为决定讽刺文字之艺术价值的客观的真实性，应该有三个主要的条件，就是第一，讽刺不应局限于私人的怨恨，而一定要有一定阶级之舆论的拥护；第二，讽刺不单单突击部分的弱点，而一

定要深入对象的本质；第三，讽刺的支持者应该是在历史的新的登场者的舆论。我同意这种见解，而素朴地引出一个结论，就是：只要立脚在和现实矛盾的发展相对应的一个现实的根据上面，那么即使在方法上取了夸张，空想，拟态，乃至浪漫架空的手法，在效果上依旧可以对观众给以真实的感动。在海涅的许多政治的抒情诗里面，他常常用他独特的浪漫主义的手法，将读者引进架空的世界里面，可是在批判现实和对丑恶投掷丑恶之点，依旧能使读者感到“德国冬天的故事”中的真实性的。至于习作《赛金花》里面的讽刺是否超过破坏真实的程度，那是只能在上演的反应里面来判断了。

第三，是关于演出的方法，对于这一点，假使您能同意我上述的处理历史的态度，那么我希望能够不拘泥于自然主义的写实方法，而创造作一种适应于讽喻史剧的新的形态。强调和我们有共同感的事象，而省略不必要的描写，明快和沉痛，这是我所期待的效果，为着这种目的，不妨采取单纯化的“表征的”舞台装置，而将更多的注意集中在音响和照明方面。

仓卒中写了这些，当然还有欲言未尽的地方，希望您能给我更深入的批判。

四，三〇。

（载《文学界》第1卷创刊号。

1936年6月5日出版）

《赛金花》余谈

夏 衍

编者先生：

你出的题目太难了，本来就不敢写，今天看了高尔基的《论戏曲的创作方法》，使我更加不敢写了，那论文里面有下记的一段：

“残念的是在我们周围，下面所说一般的事情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就是，写了一两篇戏曲的年青人，就将自己看作“此道的专家”，很快的在报纸上写文章，演讲，讲述自己的创作方法之类，有时候甚至还要写什么《戏曲理论》。……”

高尔基很谦逊地说，“我自己不仅写过两篇、五篇，大致曾经写过二十篇拙劣的剧本”，但是他还并不以一个戏剧作家而是以一个“一般文学者和剧场观客的立场”，对年轻的作家讲话。那么，很明白，编者先生，像我这样只写了一篇拙劣的戏剧的人，对于您的“征文”，还能写些什么？

至于您所说的“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态度”，那是在另一个机会已经犯过一次“不逊”了：“对同胞昂首怒目，对敌人屈膝蛇行的人物，——从李鸿章、孙家鼐一直到求为一个洋大人的听差而不可得的魏邦贤止，固然同样的是作者要讽刺的奴隶，就是以肉体博取敌人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女主人公，我只当她是这些奴隶里面的一个，我描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隶群象，从赛金花到魏邦贤，都想安置在被写的焦点之内。我不想将女主人公写成一个民族英雄，而只想将她写成一个当时乃至现在中国也还俨然存着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

的弱点的女性。我尽可能以真实地描写她的性格，希望写成她只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在这悲剧的时代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不过，我不想掩饰对于这女主人公的同情，我同情她，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些人性！”

的确，这剧本的女主人公历来就被人描写做一个不值同情的人物，一切赛金花的传记作者，都将她写成一个逾越常轨的淫娃荡妇，和“一泓祸水”，这差不多已经是“定论”了。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相信我同情她的理由的正当。过去批评她的根据，不外是下列的三点：第一，责备她不替洪状元守寡，“主人”死后有了“不检”的行为；第二，责备她不该奇装异服，在京畿招摇过市；第三，责备她不该“夜事夷寝”，

“秽乱宫禁”，伤害了华国的尊严。其实，第一第二两点，都是封建士大夫见解，到现在已经不值一笑，第三她虽则有可咎的理由，可是在和她同一时代同一事件里面不去责备读书明理、执掌国柄的人物，而一味的要求一个市井妓女去维持民族的尊严，也不能不说是一桩可笑的举动。当时名小说家吴研人的《赛金花传》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里面，的确是“颇有贬辞”，可是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贬辞”，难道我们也有“祖述”的必要吗？

赛金花不是一个寻常女子，不仅在妓女里面，就是在清士大夫中间，也很少有她一般的见识，这决不是“誉辞”，以下面的一二片段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例如：詹璋著的《花史》里面，讲到庚子事变的时候，他说：

“文忠（李鸿章）与诸大臣惶迫无能为计，有谓傅（玉莲，即赛金花）能辩此者，乃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瓦帅欣然曰：‘诺’。即日宫禁肃清。文

忠喜，酬金，不受，以所被华服饰赠之，亦弗受。无何，车驾回都。……”

同时，有清一代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他的《南亭笔记》中，也有下述的一段：

“苏（按指苏元春）下刑部狱，狱卒迺以杖毙沈荇（革命党人）之处居之，苏见地上血迹斑烂，大为骇异，询知其故，因以银三百两贿狱卒，使迁焉。其后狱卒以待苏元春之法待赛金花，金花毅然曰：“沈老爷我是认得的，为什么要怕他？”狱卒无如何也。夫赛金花一贱妓也，而其胆气竟高出久历戎行之大将，奇哉！”

这一段事实在铁屑所编《中国大运动家沈荇》中也是一样：

“狱卒牵苏元春入，元春不忍观，请以三百金别易一室，狱卒又牵南妓赛金花入，赛同时因案被逮放也。赛叹曰：‘沈公，英雄也。’遂自掬其碎肉，拌所灰土，埋之窗下。”

再按刘半农所编《赛金花本事》“所述金同”，（虽则将沈荇误作沈进），可知这并不是捏造的事实。那么，和那“久历戎行”的大将，中法战争中丧师辱国的苏元春比较一下，赛金花对于当时还是地下党的革命党有了如何的观感，单在这一小事里面也可以概见的了。

赛金花不是一个平常女子，所以我就借用了她的生平，来讽骂一下当时的庙堂人物，说同情，就在这么一点。

大热天，一时想不起要讲的话了。收到这封信，您也许要失望的，因为您所征得的并不是有意义的文，而只是没意思的信了。

匆匆即祝

编安

（载《女子月刊》第四卷第九期。

1936年9月1日出版）

《秋瑾》再版代序

夏 衍

将三八这个日子当作妇女的节日，在中国也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是一个不短的路程。风雨晴晦，影响着纪念这个节日的规模，一年盛大，一年消沉，也许下一年又因为特种的机会而“隆重”，但对于这种形式上的兴衰，我没有感慨，我也并不感到寂寞和悲哀。

从一个出类拔萃的先觉秋瑾创办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学报》，也已经四十历寒暑了。四十年间，日月盈昃，妇女杂志有过了不少的绝续与兴衰，一个时期象雨后的春筍，一个时期又如秋残的落叶，但，对于这种往往为外在原因所约制的杂志发行数字之高低，我也并不觉得这就真真表征了妇运工作的兴衰。

三十年，四十年，为着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为着中国妇女的平等独立，流血，奋斗，奋斗，流血，秋瑾的墓本已拱，为女权而呼号的书籍和刊物也已经汗牛充栋了。可是，在五十年代的今日，在抗战中的中国，“生男如狼，犹恐其犴，生女如鼠，犹恐其虎”，乃至“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的观念，还遍存在中国人的心中。“女子真真的地位是在家中”的理论，依旧为最高学府的大教授们所倡导，而仅有的妇女刊物，还不能不分出大部分的篇幅来讨论“男女是否应该平等”，“女子是否应该走出厨房”，这不是真真值得寂寞，真真值得悲苦的事么？

五四产生了若干中国的诺拉。小鸟冲出了樊笼，体味了什

么叫做自由和平等，但，当她们同时也体味了风雨的力量之后，若干“勇敢”的诺拉又用眼泪来忏悔了“年青时代的莽撞”，而重新回到“和平”的樊笼里去了。五卅与一九二七，跟历史上的新登场者一起，我们也有了刘和珍型的英雄，有了轰轰烈烈的女斗士，有了女兵，有了无数个无名的踏着荆棘的道路来寻觅自己路上的女性。但是，疾风一过，劲草几何？才十五年的岁月呢，昔年头角峥嵘的女斗士，今天已经是母仪足式的夫人太太，已经是母以子贤，妻以夫贵的命妇，甚至于已经是抄经念佛，谋幸福于来世的“信女”了。当女权和男女平等被当作少数人的敲门砖的时候，“妇运”窒息了，而真真的妇运，真真的新的女性，却在并不辩论着什么平等等类的名词的人群中诞生了！这儿没有英雄，这儿没有辉煌的演说与理论，她们要，她们做，她们把自己当作一个人，于是，她们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成员，成为顶天立地的一个人了。

过去，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岩石上的耕耘。一方面也可以说，把太多的时间化费在温室花卉的培植了。不炸毁压在地层上的岩石，作物是不能生根在土里的。把种子播在温室里，得到的收获也不过是用以炫人的一两枝奇花异卉罢了，我们珍重我们民族所产生的俊杰与英雄，这都是民族的光荣和瑰宝，但我们也还觉得假如全民族的文化能够提高这么一分一寸，却是更比一二人的光荣更值得珍重的事情。

路，很远。但不停脚，不就意味着一步步的前进么？山，是一个不可移的象征。但是当愚公将成功瞩望于他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不可移的意义不就在这一瞬间消失了么？人类永远拒绝死亡，不合理的一切必然要在永生的人类社会中消失。

（载《边鼓集》，美学出版社。

1944年10月出版）

秋瑾不朽

夏衍

今年农历十月十一日，是秋瑾烈士的一百岁冥诞。今天，了在祖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中缅怀和悼念这位伟大人物，我以为仍有其意义。作为一个秋瑾烈士的崇敬者，作为剧本《秋瑾传》的作者，使我想起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一些往事，并借此机会讲一点我写《秋瑾传》的经过。

秋瑾烈士殉国的时候，我还在蒙馆念书，这一悲壮的消息传到杭州，也曾在我 and 同学们童稚的心灵中引起了震动。辛亥革命之后，我读过一本手抄本的秋瑾烈士的诗文集。一九一八年，我在中学念书，我的一位敬爱的国文老师谢迺绩先生（他是绍兴人）给我们讲解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并讲述了秋瑾殉国的故事。当时，他用严肃的口气对我们说：“秋瑾的死，不单是为了女界的自由，也是为了全中国人的自由。”这一年，已经是五四运动的前夕，所以谢先生的这一句话特别使我不能忘却。《秋瑾传》第一次发表时原名《自由魂》，可能是受了这句话的影响。

我是杭州乡下人，所以我讲话时带有明显的绍兴乡音（可能外省人不了解，杭州城外三、五里的地方，一般人都是讲绍兴话的）。由于这种缘故，《秋瑾传》一九三七年首次在上海公演，有一位剧评家说我写这出戏是为了“表扬乡里英杰”。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我打算写《秋瑾传》，开始于一九三三年——也就是我翻译的德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这是一本最早、也是